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

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

2016年第2期

主编 张江
执行主编 丁国旗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

2016年第2期

主编 张江

执行主编 丁国旗

主编助理 贾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 2016 年, 第 2 期 / 张江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0851 - 9

I. ①马…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理论—文艺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A811. 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042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文 徐沐熙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71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经典理论解读

列宁论“文化革命”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视角 孙士聪 (1)

当前文艺领域的问题与对策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国战 (25)

文学批评探討

时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 张永清 (36)

文学批评的阐释伦理 周计武 熊海洋 (54)

作为事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 张 进 (69)

当代新媒介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构建 陈 海 (91)

基础理论研究

当代西方文论的转向及其“精英化” 丁国旗 (97)

中国文论：“他者阐释”抑或“主体建构” 杨 杰 (111)

想象的辩证法

——论后理论时代的文艺阐释学 张 中 (115)

审美现代性的危机与思想史效应

——评《审美政治化：德国表现主义问题》 汪尧翀 (132)

强制阐释论专题

- 从文本理论看 20 世纪西方文论中的“强制阐释”问题 董希文 (138)
解释即生成: 强制阐释学的生存论指向 何光顺 (151)
强制阐释论可以复制吗
——兼论中国当代文论的组织化学术形态 时胜勋 (162)
“强制阐释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毕素珍 (178)

西马理论家研究

- 阿多诺论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 常培杰 (187)
雷蒙德·威廉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吗 徐淑丽 (201)

前沿译介

-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迷失与
复苏 [加拿大]伊莫瑞·济曼著 贾洁译 (211)
什么是艺术地生存 [南斯拉夫]包亚娜·玛特吉兹著 陈春莉译 (223)
后 - 南斯拉夫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理论研究: 视角与
语境 [南斯拉夫]包亚娜·玛特吉兹
列夫·克雷夫特著 马栋宇译 (231)

《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征稿 (257)

列宁论“文化革命”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视角

孙士聪*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列宁关于“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问题的论述讨论其文化领导权理论，并考察其葛兰西、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理论回音。

关键词：列宁；“文化革命”；文化领导权

与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通过教育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样，列宁也特别强调，在经济文化落后、资产阶级占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俄国社会中，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具有重要意义。而“文化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与自由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①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列宁从俄国社会的特殊性出发，赋予意识形态的教育性、灌输性以更为重要的地位。这里主要围绕列宁关于“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问题的论述，讨论其文化领导权理论，并考察其在葛兰西、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理论回音。

一 文化与“文化革命”

在俄文中，列宁在论述“文化革命”时，使用的是“Культурная

* 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① [苏]格·斯米尔诺夫：《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载《科学社会主义I》（《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9卷），吕增奎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253页。

Революция”，其中“Культурная”是形容词，指文化的、文化上的；“Революция”是名词，指革命。据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百科全书》，“文化革命”作为斯大林时代的国家战略，“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上的根本变革，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组成部分。文化革命包括：建立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体系；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克服旧思想意识的影响，确立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移风易俗”^①。由此可知，这里的“文化革命”意指的是文化领域的革命，是在文化领域改造人民思想、推进社会文化建设的手段。依据列宁的表述，“文化革命”是继“政治变革”“社会变革”之后所必须实施的国家战略。因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②。事实上，正如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所言：“列宁主义时代（在列宁于 1924 年死后又持续了二三年），确实进行了大量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试验。改革创新、破除迷信、开拓科学领域的新人物，在艺术界、建筑界、文学界以及整个知识界蔚然成风。”^③

那么，列宁所谓的“文化革命”与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文化革命”之间的区别又如何？这里有必要做简要厘清。依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德森之见，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脱离工人运动，而且在理论上转向脱离实际的诗学领域。“首先，认识论的著作占显著优势，基本集中在方法问题上。其次，美学成了将方法加以实际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义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最后，主要理论上的离经叛道，提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大多数是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并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他们“不再从理论上正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自始至终地“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④。按照安德森的理解，“文化革命”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只不过是革命无可奈何之后唯一可能的退却。

^① [苏] A. M. 普罗霍罗夫：《苏联百科词典》，丁祖永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6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74 页。

^③ [美]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0 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所译，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5 页。

^④ [英]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5 页、99—100 页。

在他看来，资产阶级不仅仅是作为阶级，更是作为领导权而存在的，被视为既定社会意识下生产与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而与之相对的工人阶级则仅仅停留于合作的角色中。结果，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意识非但不是确证自身历史使命的因素，相反成为一种影响阶级合作的障碍。对此，安德森认为，作为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必要“创造革命意识，从而挑战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形态”，进而打破“合作意识”的局限。^① 正是基于这种对社会阶级情势的基本判断，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才以“在资产阶级脂肪上搔痒”^② 的面目而出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原本是安德森为《新左派评论》编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键读本》这一文选所写的导论，后来被视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全面的论述和考察。沃德金认为，“安德森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完成了某种目标，这种目标是雷蒙德威廉斯为文化与社会传统所完成的。”^③ 安德森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实质上是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依据英国新左派内部的某个特殊观点而产生的结构”^④。这一结构的核心就是：依据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化的最终诉求来审视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具言之，安德森并非要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客观、全面的译介，而是要引介一个文化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所展开的工作。安德森的结论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除了葛兰西还保持着“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的精神气质，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在内的其他人都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人及其之后继承者

^① [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起源》，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② “搔痒说”观点的代表者可推朱学勤与徐友渔先生，概其主要观点为三：第一，反对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普泛化地简单移植和套用，强调理论接受的本土语境性；第二，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只不过是在资本结构的文化脂肪上搔痒；第三，大众文化批判混淆了科技与科技主义之间的区别，表现出浓郁的怀旧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和十足的贵族、精英倾向。参阅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读书》1997年第11期；朱学勤《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及漏斗》，载《书斋里的革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徐友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读书》1998年第1期，该文后收入《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1页。

^③ [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历史学、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起源》，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④ 同上书，第190页。

的革命信心与乐观主义，著作充满了悲观主义的基调。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①

安德森的评价植根于英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情势之中，但“文化主义”的指斥有其合理性。法兰克福学派割裂经济学而转到文化领域有其现实基础，比如 20 世纪初期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挫折、纳粹主义以及麦卡锡主义的极权主义以及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模式，等等。然而，这一扭转的结果却有目共睹，“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社会学的出版物一片繁荣，而运用马克思方法讨论其经济基础的出版物却找不到版面”，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所谓“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以及“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而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潮更将“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推向极端，它“告别了马克思”，同时也丧失了马克思的最终和最大的优越性。^② 概言之，安德森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化与审美的革命，首先是战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其次，它不再正视政治经济问题，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③；最后，这样的革命本身就是实践性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形式，除了这一形式的革命，无产阶级不再存在其他形式革命的可能性。显然，安德森所言与列宁的“文化革命”存在着巨大差异。

首先，列宁在对立中讲文化，比如，两种民族文化、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还是黑帮的和教权派的），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④。学界对列宁的“两种文化”见仁见智，但可以明确的是，文化于阶级社会中，在其普遍性之外有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对立的情形存在，这种情形在文化类型中存在，也在特定文化的成分与要素

^① 参阅孙士聪《批判诗学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13 页。

^② A. Freeman, *Marxism without Marx: A note towards a critique*, Capital & Class, 2010, 34 (1).

^③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96—97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2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4、336 页。

中存在。如何看待文化的复杂性，列宁采取了比较开放的视野。一是要继承和发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而言。这不是一个臆造的过程，而是一个发扬现有文化中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的过程，“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①。二是文化改造与文化建设。列宁强调意识形态需要外在组织教育与有序灌输，尤其是要通过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来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以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建立其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一切阶级中去’。”^② 三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内在环节，而实现这一环节则需要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队伍主动、积极地展开教育、宣传、鼓动、组织。他们是理论家，建构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也是宣传员与鼓动员，负有向普通大众解说、阐释无产阶级思想理论的使命，并实现思想理论的接受；同时，他们还是教育、宣传的组织者，以保证确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有效展开。

其次，“文化革命”属于列宁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深化。“文化革命”是革命的必不可少环节，不仅要实现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且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经过“文化革命”。不仅掌握无产阶级政治、经济领导权，还需掌握文化领导权。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曾经批判欺骗性，而列宁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思考在该问题上对抗、斗争与建设的问题。文化领导权则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无产阶级文化领域的斗争与努力从属于无产阶级政治与经济领导权确立与巩固的需要，本质上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社会政治革命则是文化革命的先导。

再次，列宁“文化革命”这一范畴是在谈到农民合作化问题时提出的。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365页。

他指出，没有“文化革命”，就无法完全实现合作化，“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但是，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或物质方面……，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①。在这段表述中，列宁将通过“文化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确立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问题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缺失了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社会主义制度就处于残缺状态；另一方面，“文化革命”的实现是与非文化的物质领域紧密相关，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他在晚年思想中特别强调：“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②

事实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已经开始思考苏维埃文化问题了，但是在这一时期，列宁无产阶级文化及其领导权的思考，主要是从实施革命的手段和紧迫性方面出发的，强调政治宣传要揭露资产阶级政权的反动性、资产阶级文化的虚伪性，运用各种有效方式在工人、士兵和农民中间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鼓动，“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③。列宁在这一时期关于文化及其革命的思考与后来围绕“文化革命”的思考是有所区别的，但其基本思路是一贯的。

最后，列宁的“文化革命”范畴可以约略分为“政治”“文明”和“知识”这三个层面。^④“文化革命”的实质是意识形态革命，因而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然环节和组成部分；而作为文明革命的“文化革命”则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普世性”——向包括资产阶级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敞开怀抱；而作为知识革命的“文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774页。

^② 同上书，第773页。

^③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页。

^④ 张建华：《红色领袖列宁布哈林斯大林——对“文化革命”和苏维埃文化的理解与阐释》，《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1期。

化革命”则是指向政治、经济、文化都普遍落后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以提高全民文化素养。政治层面是根本；文明层面是特质；知识层面是提高，三者融为一体。而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列宁的“文化革命”则体现为四个原则：一是阶级性原则，强调以阶级标准来评判文化，坚持无产阶级对文化的领导权；二是党性原则，强调文化要为党的斗争服务，包括揭露敌人，宣传政策，鼓动群众，启蒙民众，改造思想等内容；三是人民性原则，强调文化要为人民服务；四是社会改造原则，把“文化”作为改造人民思想、推进社会建设的手段。^①由此可知，列宁的“文化革命”既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践的重要环节，又是作为其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具体化内容。

二 “灌输论”问题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曾引述考茨基关于无产阶级“灌输”的话，并评论这一段话“正确而重要”。后来围绕谁是“灌输论”的首倡者，本土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发生过争论，核心问题有二：一是在列宁和考茨基之间谁是首倡者，有观点认为是列宁首先提出，对立观点则认为列宁接受了考茨基的影响；二是在考茨基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谁是首倡者，有观点肯定考茨基首先提出，而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在考茨基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提出过这一范畴。^②稍加琢磨可以发现，上述争论所涉及的四位理论家中，考茨基多半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事实上，不仅列宁明确把考茨基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批判考茨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批判已经走得太远^③，而且西方理论家卢卡奇也批判考茨基走向“历史宿

^① 杨慧：《多重缠绕的词语政治——瞿秋白“文化革命”概念考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参见章显培等《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363页；中央编译局编《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金重《“灌输论”的首创者不是考茨基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6期；王建华《试析关于“灌输论”首创者的几种观点——兼论马克思主义灌输理论的形成》，《思想教育研究》1994年第5期；唐鹏《思想教育领域灌输概念首先提出者的历史考察——评“灌输”是考茨基首先提出的几种错误说法》，《桂海论丛》2003年第2期；孙来斌《“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1917年以来的批评理论和争论概览》，周穗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6页。

命论”的思路，主张重回唯物辩证法；佩里·安德森断言考茨基的著作“是马克思遗产的总括而不是发展”；葛兰西也批判考茨基走向经济决定论。^① 上述批判无不根植于特定历史背景之中，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考茨基却是被辩证地、历史地来看待的。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有学者指出，“考茨基无论他政治立场怎么样，他对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总算是第一个功臣。大抵他的政治思想，脱不了 19 世纪末期以来德国社会的环境，时时有妥协的倾向，因而得机会主义者的徽号”^②。百年之后，第二国际早已时过境迁，考茨基关于精神生产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关系的论述，也仍然不失为第二国际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而他与列宁之间的相互批判，在足够长的历史距离之外也完全可以获致更为从容的审视。^③ 更何况，即便列宁批判考茨基“叛徒”之余，也不忘指出考茨基“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④。考茨基批评那种将社会主义意识视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必然、直接的结果的看法，提出党的任务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列宁对此十分赞赏，称其“十分正确而重要”。^⑤

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言一直是一个重要命题，没有革命意识很难会有目标明确的现实革命行动，如何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革命思想牢牢扎根于无产阶级之中，则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⑥ 所谓“思想的闪电一旦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9 页；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47—48 页；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铭等译，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14 页；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等编译，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 页。

^② 胡汉民：《〈资本论解说〉序二》，载考茨基《资本论解说》，戴季陶、胡汉民译，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 页。

^③ 陆扬：《论考茨基的文化思想》，《上海文化》2015 年第 12 期。

^④ 《列宁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9 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选集》（第 3 卷）中文译本 1960 年版、1972 年版中，均多出一个定语“可靠的”，该句话为“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而在 1985 年版的《列宁全集》（第 35 卷）中却并没有这一定语，该句话为“那些著作仍将永远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参阅《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675 页；《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53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5—326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16 页。

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意即无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掌握，德国人之所以解放成人，正在于他们经历了一个从获致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革命思想的过程，也就是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变过程，因而，“击中”一词中某种程度包含了宣传、灌输等内涵。恩格斯在1887年1月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在美国无产阶级中宣传无产阶级思想，不能强行灌输，而应通过体验、化入心灵。^① 恩格斯还在许多著作和信件中谈到了思想“灌输”对于工人阶级的必要性，这里的思想“灌输”与马克思所讲的理论“说服”是一致的。如何将无产阶级从他所习惯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区分出来、独立建构起自己的阶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重要动机。^②

列宁自己在引用、评价考茨基的“灌输论”之前，曾经指出，革命政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③。在《怎么办》一文中明确写道：“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④ 对于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意识与革命学说的“灌输”论述，卢卡奇曾经将其概括为“被赋予”问题，并做出探讨。他认为列宁在“灌输论”中，已经区分社会主义的阶级意识与自发产生的工团意识的不同，并且强调，被赋予无产阶级意识并不应该被理解为“纯粹思想的产物”^⑤。

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基础上，考茨基进一步论述无产阶级意识的灌输问题。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文中写道：“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学说传给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后者又在条件许可的地方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② [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5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⑤ [匈]捷尔吉·卢卡奇：《卢卡奇文选》，李鹏程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201页。参阅《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47页。

争中去。可见，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① 这段话中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无产阶级并非自发地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而是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传播；其次，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理论也不是无产阶级自发产生的，而是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的宣传结果；最后，被革命意识所掌握的无产阶级将会把这一革命意识贯彻进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概言之，向无产阶级灌输其阶级意识、历史使命与阶级地位，并进而将在政治上将具有阶级意识和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在考茨基看来正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考茨基对于意识灌输的看法，并非简单强调意识灌输的强制性，无视意识接受与精神生产自身的特质与规律，恰恰相反，意识灌输必须服从与物质生产不同的精神生产自身的规律。考茨基在其他相关论述中也重视精神生产本身的自由性与个体性，因此，有必要将他的意识“灌输论”与他关于精神生产的思考结合起来。

围绕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考茨基有一个著名判断，即所谓“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在精神生产领域里，对生产的集中领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的；在这个领域里，完全可以盛行自由生产，而决不至于变成受价值支配的商品生产或者受大企业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模式。它是由无产阶级的统治，换句话说，由社会革命按照经济事实的逻辑而发展出来的，不管无产阶级的愿望、意图和理论本来如何。”^② 对此的剖析早已汗牛充栋，但对于思考文化领导权依然不乏启示性因素。如上文所述，依考茨基所见，传播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革命学说的主体并非无产阶级，而是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自身也反抗资本主义、渴望自由，无政府主义可以约略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的必然产物。而在考茨基看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某些值得肯定的方面，首先，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精神与知识生产的主体，不仅承担起无产阶级意识灌输的使命，而且也负有教育职能，通过教育“不仅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熟悉精神劳动，而且

^① [奥]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193页。

熟悉体力劳动，在他们身上牢固地扎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习惯的根子”^①；其次，精神生产与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资本主义物质生产不同，它更多是完全自由的生产；再次，不仅资本主义大生产模式不适用于精神生产，甚至连某种意识形态的集中控制对于精神生产也是不适用的。

整体来看，考茨基关于精神生产的看法不无片面，甚或乌托邦色彩，而革命意识通过知识分子精英灌输给无产阶级也使之与“马克思的联系遭到了弱化”^②，然而他对于精神生产个体性、自由性的强调，值得充分注意。精神生产与意识灌输并非仅仅简单地从外向内的强制性灌输，而且更主要地属于精神实践，因而也就是一种具有个体性、自由性的实践。正如恩格斯强调对于无产阶级思想的宣传也必须通过无产阶级自身的经验及其反思，宣传才能真正化入心灵。同样，考茨基也认识到，只有在充分发挥精神生产与接受主体的自由性、个体性的基础上，意识灌输与精神生产方能真正发挥意识革命的职能，这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三 “文化革命”与文化领导权

一般认为，列宁在 1901 年的《怎么办》中就谈及文化领导权问题，提出要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的身份深入一切阶级中去，全面发展无产阶级政治意识。^③ 这里包含了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建设策略思考，但尚未明确提出这一范畴，直至 1905 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写道，“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④，这里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需环节，而无产阶级理论家与知识分子则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不会发挥先进阶级战士的作用。^⑤ 列宁关于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其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而在关于

^① [奥] 卡尔·考茨基：《考茨基文选》，王学东编，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9 页。

^② [德] 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中译本序言，载《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5 页。

^④ 同上书，第 558 页。

^⑤ 同上书，第 311—312 页。

意识形态建设、文化革命的论述中尤为集中，这里主要结合后两者，尤其是结合其“文化革命”来简要梳理、概括其文化领导权理论。

首先，文化领导权具有斗争性。列宁认为，由于不存在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文化体系，因而必须瓦解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体系，才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确立地基，除此之外，没有中间道路。“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① 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占据工人头脑，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占据工人头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加强，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影响力的削弱。文化的斗争性从来就是与自发性相对立。正是通过“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1929年至1939年，苏联扫除半文盲4000万人，扫除文盲5000万人。^②

但是，文化领导权斗争不是暴力性的，而是建设性的；不是武器的批判，而是批判的武器。文化与思想的灌输不是强制性的，所谓建设性，一指学习，一指教育。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青年要加强学习，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敞开怀抱，学习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包含了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包含“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合乎规律的全部知识”。“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它是在“吸收和创造了两千多年来的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③ 另一方面，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27页。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文化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79、285页。